

DONGHU·RENWE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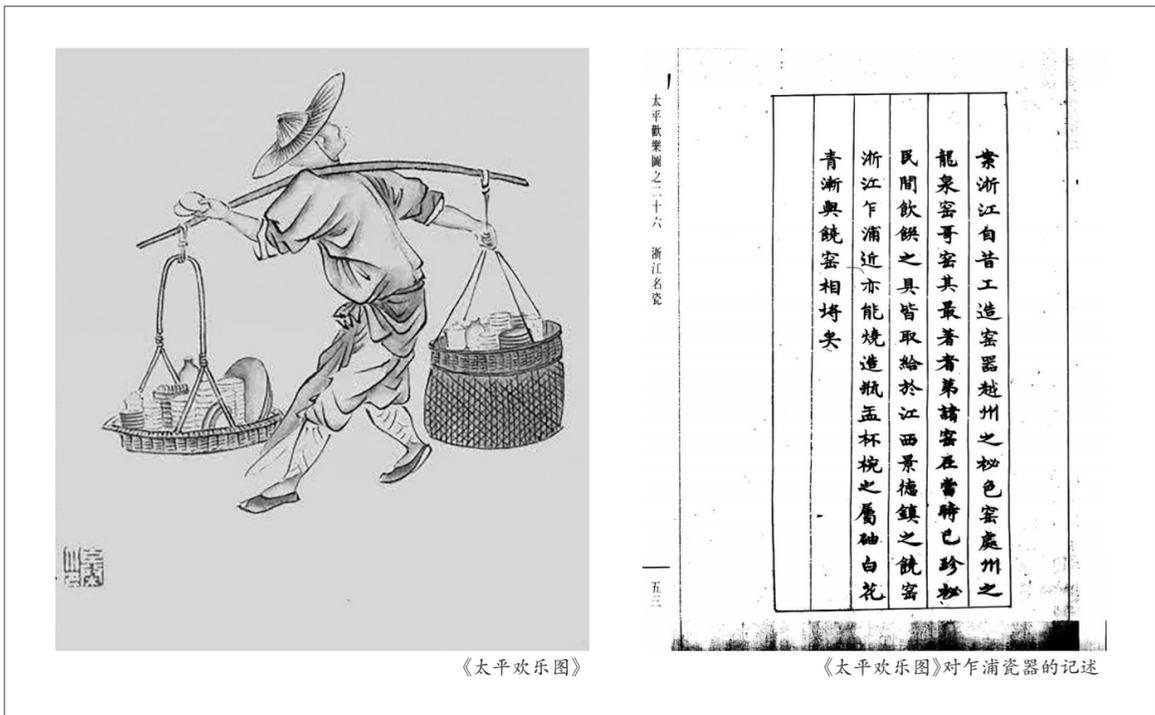
《太平欢乐图》上的“乍浦瓷窑”

■ 姚梦兰 陈正其

乍浦镇南河滩火神弄码头南转向东至南外大街外有一条里弄，叫碗升弄。过去不少业余文史研究者和当地居民围绕“碗升弄”这一地名，对乍浦历史上有没有建过瓷窑进行过探讨。有人认为，乍浦历史上应该有瓷窑。理由是碗升弄西面不远的地方曾是一片农地，过去当地居民在翻耕时发现到处都有破碎的陶瓷片，有人怀疑这块地方就是历史上“乍浦瓷窑”的所在地，而碗升弄则是南外大街通往“乍浦瓷窑”的一条里弄。但也有人认为，乍浦碗升弄可能就是一处堆放瓷器的地方或者是瓷器仓库，理由一是乍浦没有烧制陶瓷的原料；二是，历史上的乍浦在宋淳祐六年（1246年）开港后，一度拥有通往大食（今阿拉伯）、古暹罗（今泰国）、占城（今越南中部）、勃泥（今文莱）等国的海外航线。当时乍浦港出口商品主要为瓷器、丝绸、金银、铅锡等货物，进口主要为香料、犀牛角、琥珀、水晶等。由此推测，可能因为出口瓷器的需要，乍浦某地建立了陶瓷仓库或陶瓷交易市场，久而久之，陶瓷仓库或交易市场的进出地就有了碗升弄这一地名。这些争论都各有道理，且是围绕乍浦碗升弄展开的，但乍浦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建过瓷窑，还有待考证。

最近，乍浦镇综合文化站文保工作者在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中，从《太平欢乐图》中发现一幅以民间瓷器贸易为题材的画作，一农人肩挑着一担瓷器，图画边配的文字特别说明：“案浙江自昔工造窑器，越州之秘色窑，处州之龙泉窑、哥窑，其最著者。第诸窑在当时已珍秘，民间饮饌之具，皆取给于江西景德镇之饶窑。浙江乍浦近亦能烧造瓶、盃、杯、碗之属，瓷白花青，渐与饶窑相埒矣。”这一说法，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乍浦历史上应该建过瓷窑。

为从《太平欢乐图》中探寻乍浦历史上有没有建过瓷窑这一问题，乍浦业余文史爱好者查找到了有关《太平欢乐图》及作者的相关史料。《太平欢乐图》是清代嘉兴风俗画创作的代表之作，作者方薰，祖籍安徽歙县，高祖始迁嘉兴府石门县城（今桐乡市崇福镇）。方薰生于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，父亲方梅，号白岳山樵，工诗善画，志行高亢，小时候就聪慧的方薰深受其父影响，喜爱吟诗作画。他夜以继日临摹家中储藏的众多古画，十五岁时就随父亲游三吴两浙，认识不少书画名家，耳濡目染，广受陶冶，经多年苦学，



《太平欢乐图》

《太平欢乐图》对乍浦瓷器的记述

打下了扎实的绘画基础。他的山水画，结构精妙，风致闲逸；人物花鸟画，运笔赋色，别开生面。渐渐地，他的画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喜欢。后来，方薰和比他小十四岁的桐乡人金德舆成了忘年交。金氏是桐乡远近闻名的收藏大家，累世收藏不少法书名画及宋刻书。据传，金德舆久闻方薰大名，邀请他来金家做客，拿出收藏的古贤名迹与他一起品鉴，并邀方薰在桐华馆执教金氏子弟。课余之暇，金德舆还让方薰为信佛的金母写经、绘佛像。由此，方薰与金德舆一起潜心研习、考订鉴赏书画，兴味无穷。

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年），金德舆在听到乾隆皇帝要第五次“南巡”的消息后，与方薰商定创作一套反映江南水乡民俗风情的图册，以信佛的金德舆母亲的名义把图册献给皇上。于是，方薰赶紧到处采风，精心绘制图画，金德舆又请姐夫赵怀玉、舅舅朱方澍查阅不少书籍，撰写配合图画的文字说明。这就有了由方薰绘绘、赵怀玉、朱方澍撰写的附图说明，最后由迁居桐乡县青镇（今乌镇）杨树湾的安徽歙县秀才、藏书家鲍廷博

题取名字的《太平欢乐图》。这部作品共有一百幅图画，反映了江南平原百业兴旺、百姓安康的市井生活和江南水乡的民俗风情。农人肩挑一担瓷器正是其中的第二十六幅画。

据史料记载，当年乾隆皇帝一到桐乡，金德舆就献上了这套《太平欢乐图》和金德舆家藏的宋版《礼记》。乾隆皇帝龙颜大悦，称《太平欢乐图》很有创意，是一套记录杭嘉湖地区风土人情、展现老百姓安居乐业、百工技艺场景的生活长卷，从侧面深刻映照出江南地区的繁荣昌盛与富庶景象。于是，乾隆皇帝随即吩咐赏赐金德舆缎匹若干，嘱其北上补官。

得到皇帝的肯定，在当时无疑是一件大事，《太平欢乐图》也因此声名远播，享誉四方。考虑到正本《太平欢乐图》既已被皇家藏入深宫，方薰又画了一套《太平欢乐图》副本，各地文人雅士慕名纷纷前来欣赏，方薰的名气在艺林中一下子扶摇直上。连乾隆时的榜眼洪亮吉也饶有兴味作诗题方薰的《春居图》。洪亮吉对方薰“富有千顷波，贵作五湖伯”的隐士风度大为赞赏。

坛并不多见，而图画上撰写的文字则点明了乍浦瓷窑“亦能烧造瓶、盃、杯、碗之属”，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，乍浦历史上的“乍浦瓷窑”之说并非空穴来风。

其实，关于《太平欢乐图》上记载的乍浦瓷窑“亦能烧造瓶、盃、杯、碗之属”一说，在裴光辉主编的《中国古代名瓷鉴赏大系——龙泉青瓷》一书中也有这样一段记载：“故宫所藏从康熙到光绪的六件纪年款龙泉青瓷，过去一直被称为‘乍浦龙泉’，是乍浦仿烧龙泉窑的产品。”有位收藏家经过研究后认为：“乍浦龙泉”应该属于龙泉窑系，并且烧制过“官搭民烧”的官窑青瓷，因为故宫博物院藏的六件刻有“乍浦龙泉”的青瓷都是有纪年款的。这位收藏家的研究结论是：“乍浦龙泉窑历史上曾经仿烧过龙泉窑青瓷产品”。

有位收藏家曾见到过三只40公分左右的元代葵口刻花龙泉窑系青瓷大盘，也收藏了一只，其青瓷釉色比龙泉本窑的上品梅子青稍微偏黄绿一点，窑红也更深一点，但做工很规整，刻花很精细，青釉像堆脂，釉厚约半公分。这种大盘属外销瓷，古代主要出口中东地区。中东古伊斯兰教人有围着大盘，一边烤火，一边用手抓大盘中美食的习惯，所以这种大盘又大、又厚、又重，和内销瓷不同。如果这些青瓷大盘是龙泉本窑生产的，那么应该在温州、福建一带的港口上船出口，何必舍近求远转运到乍浦港来出口？所以这位收藏家认为，从传世青瓷品来看，乍浦应该有龙泉窑，烧制的青瓷主要供出口并且有一部分内销，且乍浦龙泉窑很有可能起源于宋元时期。特别是乍浦九龙山，其独特的环境也比较符合古人在山坳里或山坡上建窑的条件。根据古乍浦港的地形，选址碗升弄附近的山坡地作为瓷窑也是很合适的，生产的瓷器可以非常方便地运出去，通过乍浦港远销海内外。

从《太平欢乐图》和《中国古代名瓷鉴赏大系——龙泉青瓷》这些信息看，历史上的乍浦应该建过瓷窑。那么，乍浦瓷窑究竟建在何方呢？至今仍是谜，有待考古工作者去发现。虽然因为时代发展，加之历史上乍浦屡遭战乱侵扰，其地理环境亦随之发生了诸多变迁，前人也并没有给后人留下有关乍浦瓷窑比较详细的历史文字记录，但清代嘉兴风俗画作者方薰的代表作《太平欢乐图》关于乍浦瓷窑之说，《中国古代名瓷鉴赏大系——龙泉青瓷》一书中关于“乍浦仿烧龙泉窑产品和乍浦龙泉”的记载，还有乍浦地名“碗升弄”，或许就是前人留给后人寻找“乍浦瓷窑”的一些历史印记和线索。

段成式和《酉阳杂俎》

■ 褚亚芳

部为《太平广记》《太平御览》《文苑英华》)记载，段成式与李商隐、温庭筠并称为“三杰”。段成式尤长于骈文，因与李商隐、温庭筠皆排行十六而诗则词以偶偶相夸，故时人又称为“三十六体”。段成式有《留芳词》，又有《折杨柳歌》中有“莫留莺语向黄昏”之句，系与诗友诗僧石偈于三宜庵饮酒吟诗之作。他交友广泛，在退居襄阳时，曾与温庭筠、余知古、周繇、韦鹢诸人同游徐商幕，赋诗唱和，后编为《汉上题襟集》十卷、《段成式集》七卷。

据《平湖县志》1993年版记载：段成式晚年曾寓吾邑钟溪段墅塘。他著述颇丰，著有《酉阳杂俎》《庐陵官下记》二卷（已佚）。诗三十余首，收在《全唐诗》中。文十一篇，收在《全唐文》里。而在段成式的所有著作中，以《酉阳杂俎》最为知名。这是一部奇书，可以说集五花八门、包罗万象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，被推为“自唐以来，小说之翘楚”。

《酉阳杂俎》中的“酉阳”，是今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的二酉山的别称。相传当年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时，博士官伏胜偷运书籍五车千卷，藏于此山石洞内。直至秦亡，才拿出来献给汉高祖刘邦，终于保住了春秋诸子百家的文化，不致断绝。后就以“酉阳”来借指传世珍贵的书籍。梁元帝为湘东王时，撰荆州，好聚书，赋有“访酉阳之逸典”语。段成式以家藏秘籍与酉阳逸典相比，且其书内容又驳杂广泛，故所著小说以《酉阳杂俎》为名。

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写于公元九世纪中期，他本人认为该书为志怪小说。他在序言中说：夫《易》象一车之学，近于怪也；诗人南箕之兴，近乎戏也。固服缝掖者肆笔之余，及怪及戏，无侵于儒。无若诗书之味大羹，史为折俎，子为醢醢也。炙鸭羞鳖，岂容下箸乎？固役而不耻者，抑志怪小说之书也。成式学落词曼，未尝覃思，无崔駰皇龙之叹，有孔璋画虎之讥。饱食之暇，偶录记忆，号《酉阳杂俎》，凡三十篇，为二十卷，不以此回录味也。

序文大意为：《易》书里讲了一个故事，说一个远游的人夜里见到猪拉着一车鬼，后来又发现原来是人，这样的话，近似于怪异之说，《诗经》里面关于“维南有箕”这样的起

兴，也是戏说吧？所以像我这样穿着宽大衣袍的儒者，随便说说一些怪异的事情，一些类似于戏说的话，对于儒者的尊严使命并没有什么侵害。但是读书人往往形容我们读书就像享用美味，各类经书就像肉汤，史书就像拆解好的肉，诸子著作就像醋酱之类的佐料，如果是烤猫头鹰和小鳖，那也是能吃的吗？坚持做这件事并且不以为耻的原因，也许是因为这是一本类似于《易》中卦象说的那种志怪小说类的书吧。我段成式学问不深，辞藻不够华丽，也没有经过什么深入的思考，没人会把我当成什么大才人，如果一定要去做那些大人干的事的话，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犬，徒然被人耻笑。吃饱饭没事干的时候，把自己记得的一些事情写下来，因为较多而且繁杂，所以起名叫《酉阳杂俎》，共三十篇，分成二十卷，并不想把这本书当作什么好东西，成为能够被读书人称道的典籍啊。

《酉阳杂俎》为文言笔记体小说，就内容而言，远远超出了志怪小说的范围。它包罗繁杂，有自然现象、文籍典故、社会民情、地产资源、草木鱼虫、方剂医药、佛家故事、中外文化、物产交流等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从大的方面来讲，区分为志怪、传奇、杂事三类。其中，志怪类小说题材包括神仙（17篇）、鬼怪（61篇）、佛道（80篇）、动植物（59篇）、器物（61篇）、征兆（25篇）六类；传奇类小说包括情感（4篇）、豪侠（7篇）、异遇（8篇）三类；杂事类包括野史轶闻（64篇）、知识道理（569篇）、寺庙游记（78篇）、神话传说（100篇）、地域民俗（86篇）、方术技艺（31篇）、考证（38篇）七类。

例如志怪类小说说征兆篇：上尝梦日（一作白）鸟飞，蝙蝠数十逐而堕地。惊觉，召万回曾曰：“大家即是上天时。”日而崩。意思是：皇帝曾经做梦梦见一只白鸟在飞，被数十只蝙蝠追逐，最后这只白鸟掉到了地上。皇帝被这个噩梦惊醒，就叫一个叫作万回的和尚来询问。和尚说：“皇上这是要升天了。”第二天皇帝就死了。

又如杂事类有野史轶闻：骆宾王为徐敬业作檄，极疏大周过恶。则天览及“蛾眉不肯让人，狐媚偏能惑主”，微笑而已。至“一抔之土未干，六尺之孤安在”，不悦曰：“宰相得失如此人！”译文意为：骆宾王为徐敬业

作檄文讨伐武则天，在檄文里尽力抨击武则天的罪恶。武则天在看这篇檄文的时候，当看到“蛾眉不肯让人，狐媚偏能惑主”时，只是微笑而已，并不生气。等看到“一抔之土未干，六尺之孤安在”的时候，她不高兴地对丞相说：“宰相怎么让这么一个有才华的人，跑到敌人阵营那边去了！”

《酉阳杂俎》资料丰富，可补史料之不足。宋代欧阳修等人在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中将其列为子部小说家类。周登则认为此书既包含志怪小说，又包含杂家小说。明代赵琦美认为此书主要记录志怪小说，胡应麟也认为它是志怪小说。清代纪昀等人认为此书既包含志怪小说，也包含杂事小说。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称：“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、荒渺无稽之物，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，故论者虽病其浮夸，而不能不相征引。自唐以来，推为小说之翘楚，莫或废也。”这里的“诡怪不经之谈”属于志怪类小说，而“遗文秘籍”则属于杂事类小说。到了近现代，《酉阳杂俎》逐渐为更多学者们所关注。鲁迅先生认为《酉阳杂俎》可以与传奇小说相媲美，他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说：“所涉既广，遂多珍异，为世爱玩，与传奇并驱争先矣。”即使在海外也备受重视，英国作家李约瑟所著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，美国学者劳费尔所著《中国伊明编》，都多处援引了《酉阳杂俎》的材料。

《酉阳杂俎》还认真地记载了有关陨星、化石、矿藏的发现，动物、植物的形态与特性，为我们当今研究古代矿物、生物等学科，提供了有用的参考资料。如以动物学为例：前集卷十六·羽篇：“鸽，大理丞郑复礼言，波斯船上多养鸽。鸽能飞行数千里，辄放一只至家，以为平安信。”记载了当时波斯船舶上训练信鸽传递消息的事，这是一条关于信鸽比较早的材料。这部书的传奇部分，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，而且如《物异》《广动植》等篇在科学上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。又如关于无机酸的记载，《酉阳杂俎》在前集卷七·医篇中载：“王玄策俘中天竺王阿罗那顺以诣阙，兼得木士那罗迦婆，言寿二百岁。太宗奇之，馆于金门内。造延年药，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。言婆罗门国有药名畔茶佐水，出大山中石臼内，有七种色，或热或冷，能消草木金铁，入手入则消

烂……”这种无机酸——畔茶佐水，比欧洲最早十三世纪的记载，还早六百年。

段成式不朽的志怪奇书《酉阳杂俎》，足以让他傲视千古文坛。后世的志怪小说家莫不以他的这部著作作为模板而去创作，可以这么说，《酉阳杂俎》是一部上承六朝，下启宋、明以及清代志怪小说的重要著作，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。如清代蒲松龄的名作《聊斋志异》，就是大量吸纳了《酉阳杂俎》的思路与故事。即使是当代著名的盗墓小说《鬼吹灯》，很多荒诞离奇的故事也都取材于《酉阳杂俎》。

1993年的《平湖县志》记载：段成式，唐太和时学者，晚年居钟溪段墅塘。段成式晚年辞官后，寓居嘉兴市钟镇，在原段墅桥西南处建造了一幢私宅别墅，还在钟溪西南（现丰乐桥南至七星桥处）开挖了一条段墅塘。段墅塘俗传味甚鲜美，兼无筋骨，外此皆不及也。”段成式又出资在段墅塘北端接钟镇市河口处，建造了一座石桥，名为“段墅桥”。该桥是一座东西走向的单孔石桥，长约6米，宽1.5米，东西各有6级石阶。此桥的建造，极大地方便了当地百姓的出行。

段成式为当地百姓所做的诸多善事，钟镇政府和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唐代著名的文学家，清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，钟镇镇创办阅报社，特取名为“段墅阅报社”。民国期间创办小学，定名为“段墅小学”。二十世纪80年代，钟镇镇文化站编辑文艺刊物，命名为《段墅文艺》。至1990年，因钟镇镇建设农贸市场之需，将段墅桥拆除。1993年，钟镇镇政府规划新建建设，段墅浜被列为建造兴路街道商品房地块，将本已淤泥满浜的段墅塘填平建路。尽管历经千年的段别墅、段墅塘、段墅桥已不复存在，但段成式寓居过平湖钟溪的史实已记录在有关的志书中，关于他的故事流传在当地名人文化的传承中。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等图书，在平湖市图书馆的古籍馆中被收藏，供后人研读与缅怀，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文化纽带。

柯古逸归别墅空，
莫留莺语莫留穷。
更怜石偈耽诗酒，
不见诗瓢与酒筒。

清代诗人沈步青在《钟溪棹歌》中，对晚年流寓平湖钟溪的段成式有如上的记载，诗中开头的柯古就是指唐代著名的志怪小说家段成式。

段成式（803年—863年），字柯古，祖籍山东临淄，生于四川。他家世显赫，其七世祖从唐太宗李世民征战有功，是“凌烟阁二十四功臣”中位列第十的段志玄。他的外公武元衡，则是唐宪宗时的铁腕宰相。父亲段文昌在唐穆宗时任宰相，官至节度使，死后追赠为太尉。段文昌除颇有政声外，还享有文名，其作品最为人品评的当属《平淮西碑》，该碑文原是韩愈所书写，后被磨去，又有段文昌受命重作。这种“一碑二文”是世属少有的雅事，已流芳千年。

我国历史上有四大“读书台”，明代著名文学家、书画家陈继儒曾说：董子读书台在广川，梁昭明读书台在招隐，段文昌读书台在广都县（今成都双流区）之南龙华山，和靖读书台在虎丘。段文昌年轻时十分好学，他向往四川，便游学来到成都，看中了广都县南龙华山下一块倚山平地，既清静又显无限风光，便搭了一幢茅屋，建幽径与外路相通，置身其内，闭门读书，以进仕途。儿子段成式也曾在此读书。宋代诗人何耕的《段文昌读书台》诗曰：段公曾此读群书，读破应须万卷余。家礼一传为杂俎，稗官收拾附虞初。此诗说，段家父子在此读书破万卷，段成式的笔记小说集《酉阳杂俎》，成为段家传家宝加以传承。

段成式自幼即勤学苦练，博学强记，广泛涉猎，如其自言“以君子耻一物不知”。故其博见洽闻，为时人所叹服。同时，段成式也是一个读书、行路两不误的达人，年轻时他随父亲转徙于成都、长安、荆州、扬州等地，了解各处风土人情及趣事逸闻，极大地开拓了文化视野。后来他在出任秘书省校书郎时，更是精研苦学，博览包括官府秘籍在内的海量图书，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据“宋四大书”之首的《册府元龟》（另三